

## 彭湃與海豐農民運動 1921-1924

佟以群

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 摘要：

1949 年中共建立政權主因之一係由於擁有農民力量，而為喚起農民乃有農民運動的施行。近代中國農民運動起於廣東海豐，海豐農民運動領導者為彭湃，本文將探討彭湃與初期海豐農民運動的關係，並說明農運發生之背景因素。

彭湃為什麼會注意到農民問題，並進而掀動海豐農民運動呢？此或與其赴日留學，接觸當時盛行的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想，及回國後注意到農民生活有很大的關係。

廣東海豐是個傳統而保守的縣城，鄉紳宗族、軍閥的勢力籠罩一切，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對於農民運動的開展勢必有著一定的影響。

本文擬探究彭湃、海豐二者之間的人地關係；新式知識份子彭湃是如何在傳統鄉紳勢力龐大的海豐來推行農民運動？海豐農運又為之後中國農民運動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至於處理時段則集中於 1921 年彭湃任海豐勸學所長至 1923 年七·五農潮與 1924 年陳炯明正式解散農會為止。

**關鍵字：**彭湃，海豐，農民運動

## 一、前言

中國自古以來即是以農爲本，龐大的人口之中，農民所佔比例甚重。1949 年中共建立政權主因之一即係由於擁有農民力量。而爲成功喚起農民，從早期創黨伊始至建國以前的各個不同時期，致力於動員農民、推動農民運動，並有土地改革等等的施行。近代中國農民運動蓬勃開始於廣東海豐，海豐農民運動領導者爲彭湃。然海豐農民運動並非一帆風順，從早期絕少農民願意加入的創業維艱時期，到漸入佳境卻又被陳炯明解散因而組織轉入地下的秘密活動時期，經過東征、北伐的蓬勃發展，後又因蔣中正清黨而爲之頓挫。故海豐農民運動實可分爲多個時段來分析探討。本文所欲探究的時段即最初期農運的開展至農民協會被陳炯明解散爲止。

廣東海豐是個傳統而保守的縣城，宗族的力量百年來根深蒂固、軍閥陳炯明家族的勢力籠罩一切，在這樣的環境下，它爲何會成爲中國近代農民運動之濫觴？海豐有著傳統與革新的衝突，此一矛盾對於農民運動的展開有何影響？

彭湃出身於海豐的大地主家庭，並曾至日本留學；這樣的出身背景，彭湃爲什麼會注意到農民問題，並進而掀動海豐農民運動呢？此或與其赴日留學，接觸當時盛行的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想，以及回國後注意到農民生活有很大的關係。凡此種種，俱值深入探討。

本文欲探究彭湃、海豐二者之間的人地關係；新式知識份子彭湃是如何在傳統鄉紳勢力龐大的海豐來推行農民運動？海豐的歷史背景、地理環境對於農民運動有何助因？海豐農民運動又因何爲陳炯明解散？陳

炯明對於海豐農民運動又是抱持著如何的態度？海豐農運又為之後中國農民運動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希以人地關係的探討，而可對於海豐農民運動之開展與起落有著更詳細的瞭解。至於處理時段則集中於海豐農民運動的初期，即從 1921 年彭湃任海豐勸學所長，由此開始進行一連串改革，改革失敗轉而投向農民運動開始；至 1923 年七·五農潮及農潮之後（1924 年）陳炯明正式解散農會為止。

## 二、彭湃—從地主之子到農運先驅

1896 年 10 月 22 日，彭湃出生於海豐縣城東郊橋東社，初名漢育，到日本留學後才改名為湃。彭湃家境富實，據其在〈海豐農民運動〉中談及他的家庭時，說：「我的家庭在海豐縣可以算個大地主，每年收入約千餘石租，共計被統轄的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sup>1</sup>因此彭湃家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的大地主。<sup>2</sup>

在彭湃的少年時期，生母周鳳是貧苦農民出身，當過婢女，十六歲嫁到彭家當庶母；她經常對彭湃講述農民的生活，<sup>3</sup>使彭湃從小對於貧苦的農民有著同情的心理。根據周鳳的回憶，彭湃小時候即會因為同情農

<sup>1</sup>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收錄於人民出版社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年 10 月，初版），頁 52。

<sup>2</sup> 彭湃家族，其家產財富與當時陳炯明家族陳月波、陳少岳齊名，更可知彭家在當地之殷富。見海楓，《海楓文化革命概述》（香港：中報週刊，1969 年，初版），頁 111-112。

<sup>3</sup>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1 月，二版），頁 2。

民，而曾脫口說出「你們都不要交租」的話語。<sup>4</sup> 資料也許誇大其辭，但是我們卻可推知，彭湃雖然身為地主之子，但是對於貧苦農民的生活仍可藉由其生母得知，這對將來彭湃推展農民運動、接觸的歷程應有著一定的影響。

1913年，彭湃海豐第一高等小學畢業，進入海豐中學就讀。就讀期間，彭湃和一群學校裡的學生組成了「群進會」。「群進會」是以學習新思想、新文化為目的的學生團體；據一些成員後來的回憶，主要是閱讀一些宣傳當時流行的社會政治學說的書刊，議論當地發生的事情。<sup>5</sup> 並且，彭湃也曾於1916年的五七國恥紀念日，和同學們一起組織過反日愛國示威遊行。<sup>6</sup> 自是，對於彭湃的少年性格我們可以有了初步的瞭解：熱心參與政治的討論及行動。當然，民國初年政局不穩，當時知識份子均熱心政治或是關心國家，彭湃性格自受時代背景影響。

經歷過群進會之後，彭湃覺得應該學習進步國家的政治知識以救中國，因此渴望到日本留學。但是彭湃的祖父持反對態度，彭湃遂托彭家的世交陳其龍來勸說彭湃祖父。<sup>7</sup> 彭家雖然是個富有的地主之家，但是並無政治實力，彭湃的祖父在陳其龍的勸說之下，懷著讀書當官、將來免受欺侮的希望，便成全了彭湃的渴望，送其至日本留學。<sup>8</sup>

---

<sup>4</sup> 周鳳，〈彭母談彭湃〉《海豐文史》第四輯，1986年，頁14、15。

<sup>5</sup> 余炎光，〈彭湃思想發展初探〉，《暨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3期，頁15-16。

<sup>6</sup> 華南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廣東海豐縣紅宮紀念館《彭湃傳》編寫組，《彭湃傳》（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初版），頁12。

<sup>7</sup> 蔡洛、余炎光等，《彭湃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初版），頁11。陳其龍，廣東海豐人，同盟會會員，曾任陳炯明粵軍司令部機要秘書。

<sup>8</sup>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二版），頁4。中共方面的著作幾乎採此種說法。但是此仍有疑問。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初版），頁202中提到彭湃是受了陳炯明的資助及關照。彭湃家人反對彭出國給予資助

1917年初，彭湃東渡日本求學，先在為中國留學生進行預備教育的成城學校補習，翌年五月畢業，同年9月30日進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學，就讀於專門部政治經濟科（三年制）。<sup>9</sup>彭湃初到日本，寄寓於基督教青年會為中國留日學生提供的宿舍，當時認為基督教也可以救國，曾一度信仰過基督教。<sup>10</sup>

在日本的生活中，彭湃延續其少年性格，仍積極關心中國之政治，而中日之間的關係此時已瀕於緊張，彭湃便曾經說：「以為生做中國人的唯一責任是救國，當頭的急務是排日」。<sup>11</sup>於是，1918年和1919年的留日中國學生的反日救國運動，彭湃都是積極的參與者和組織者。<sup>12</sup>

1919年，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導致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利轉移到日本身上。消息傳到東京，彭湃憤慨不已，甚至寫血書「毋忘國恥」四大字寄回海豐學生聯合會。暑假，彭湃回到海豐，組織了「海豐白話劇團」，演出過『打倒帝國主義』之類的短劇。<sup>13</sup>也因此，海豐百姓對於

---

極少（彭先至廣州唸書，此應為其家人贊助），且陳炯明當時亦想網羅知識份子，故會資助一些學生至日留學，歸國後以為己用；而依當時政局不穩、出國手續麻煩的情況之下，彭湃如有陳炯明之幫助，出國當可成較簡易之事。加以陳其龍曾任陳炯明機要秘書，二人關係斐淺，極有可能為了出國方便，而將彭湃介紹與陳炯明認識，以獲陳之幫助。國外學者有與陳永發相同之說法，見 Roy Hofheinz, JR., *The Broken Wave—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頁 143。另也有學者認為彭湃家境富裕，不可能讓陳炯明資助，見 Fernando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頁 54-55。詳細情形將留待日後資料蒐集齊全再行討論。

<sup>9</sup>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卷〉，頁 4。

<sup>10</sup> 余炎光，〈彭湃思想發展初探〉，頁 16。

<sup>11</sup> 李春濤，〈海豐農民運動及其指導者彭湃〉，收錄於彭湃研究史料編輯組編，《彭湃研究史料》（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頁 283。

<sup>12</sup> 彭湃參與反日救國運動，而曾為此受傷。詳細經過可參看王拱壁，〈東遊揮汗錄〉《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2期，頁 108-123。

<sup>13</sup>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卷〉，頁 5。

彭湃，便有了熱心於反日愛國的印象。

1918年，日本發生了因米價暴漲，造成農民搶米的「米騷動」事件，此事刺激了日本社會各階層，加以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許多大學紛紛出現了社會主義的社團團體，比如東京大學的「新人會」、早稻田大學的「建設者同盟會」等，開始了研究社會主義的風潮。<sup>14</sup>暑假結束，彭湃回到日本繼續留學。這時正在日本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深深吸引了彭湃的目光，不久就參加早稻田大學的一些左翼學生組成的「建設者同盟」。「建設者同盟」是以研究社會主義諸家學說為主，尤其注意研究農民問題和強調從事農民運動。根據日本警察署的資料來看，建設者同盟從1920年5月至年底，學習討論的內容包括：當前思想和問題、工聯主義、無政府主義、婦女問題、蘇維埃研究等。<sup>15</sup>這些建設者同盟的成員多數來自於農村，因此早就著眼於農村，致力於研究和調查農村問題；日後這些人多成爲日本農民運動的前輩，與彭湃一心一意專是於農民運動，應有其因果關係。<sup>16</sup>

除了思想上受到日本農民運動者的影響以外，在建設者同盟期間，由於其要求成員親自到農村去進行觀察、調查，並參加農村的實際運動；故彭湃曾經參加了建設者同盟支持農民反對地主、要求實行減租的一次行動；也曾參與對一個縣的佃農糾紛的實際調查。<sup>17</sup>這對於彭湃日後親自到農村進行農民運動的理論與實際行爲的紮根應該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

---

<sup>14</sup>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台北：三民書局，1996年，初版），頁289-290。

<sup>15</sup> 余炎光，〈彭湃思想發展初探〉，頁16。

<sup>16</sup> 衛藤瀨吉，〈海陸豐蘇維埃史·上〉《共黨問題研究》，1999年第8期，頁62。

<sup>17</sup> 華南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廣東海豐縣紅宮紀念館《彭湃傳》編寫組，《彭湃傳》，頁24-25。

另，彭湃覺得其所信仰的基督教認識不深，及對一些基督教徒的行爲不贊同，遂翻然一心研究社會主義諸家學說。至是，彭湃遂始漸成爲一廣義的社會主義者。<sup>18</sup>

1920年11月，以建設者同盟的成員爲骨幹組成了「可思摩俱樂部」(Cosmo Club)，名稱改變，參加的成員也更加多元，但基本思想仍與建設者同盟相同，只是多了些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參加了這一可思摩組織，彭湃開始受到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尤其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sup>19</sup>可見彭湃最早開始信仰的其實並非馬克思主義，而是無政府主義。大約在這時期前後，彭湃和一些留日同學如李春濤組成了「赤心社」，研究十月革命和蘇維埃俄國問題。赤心社不定時出版刊物《赤心》，也不定期舉行學習會，學習許多社會主義思想。除此以外，彭湃還曾經直接到京都帝國大學去聽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河上肇講課。<sup>20</sup>

1921年，留日中國共產主義小組在東京成立，負責人爲施復亮。施復亮欲吸收彭湃參加共產主義小組，曾於彭要回國之前與其聯繫作了一次長談，終因兩人對中國農民問題的看法不同而沒有吸收彭湃爲小組成員。據施復亮後來回憶指出，彭湃此時已覺得中國的革命要依靠農民，此點比毛澤東的說法要早許多。<sup>21</sup>

彭湃早期在海豐所接受的是群進會民主革命的思想，到了日本以爲基督教可以救國；但是一些實際的活動（如反日愛國行動）卻讓彭湃發現溫和的基督教難以解決問題。之後，彭湃參加了建設者同盟，在這團

<sup>18</sup> 李春濤，〈海豐農民運動及其指導者彭湃〉，頁283。

<sup>19</sup> 余炎光，〈彭湃思想發展初探〉，頁17。

<sup>20</sup>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卷〉，頁9。

<sup>21</sup> 王曼、楊永，〈彭湃傳〉（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初版），頁41。

體之中，彭湃接觸到許多社會主義學說，又再加上建設者同盟這些農村出身的左翼學生影響，社會主義學說已經牢牢在彭湃心裡紮下了根。而建設者同盟強調的實際農村調查活動，也影響了日後彭湃親自下鄉調查的行爲。後來彭湃參與的可思摩俱樂部及赤心社都更加強了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因此，日本的留學生活可說是爲日後共產黨員、農民運動大王彭湃思想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尤其彭湃在年少之時，即因其生母周鳳的影響，對於農民有著同情心；在日本的實際農村調查、農村活動之中，相信彭湃應當已有解放海豐農民的想法。

1921年5月，彭湃因祖父母病重，參加完畢業考後，便提前歸國回到了海豐。<sup>22</sup>回到家鄉之後，或許是在日本受到了社會主義薰陶的影響或是跟施復亮長談之因，彭湃到廣州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sup>23</sup>從前彭湃對於馬克思主義僅僅只是研究，參加了社青團與更多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接觸之後，漸漸對馬克思產生了「信仰」。在1923年9月，彭湃在一封信中說：「我從前是很深信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兩年前才對馬氏發生信仰。」<sup>24</sup>

彭湃從廣州回到海豐之後，發起組織了「社會主義研究社」，參加這研究社的有七十多人，大多是青年學生，其中像是林甦、李國珍，都成了日後彭湃從事農民運動的助手。社會主義研究社平常用座談（或可說討論更恰當）和專題演講的方式來進行活動：討論過李大釗的一些如〈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專題演講主要由彭湃負責，彭湃講過《唯物

<sup>22</sup>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卷〉，頁10。

<sup>23</sup> 彭湃加入社青團的原因除了可能受到施復亮的影響以外，根據陳善光，〈論廣東團組織的創建〉，收錄於陳善光編著，《青年運動史論集》（廣東：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36提及彭湃之所以加入社青團，可能是陳獨秀吸收進入的。

<sup>24</sup> 轉引自余炎光，〈彭湃思想發展初探〉，頁17。



史觀》、《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十月革命後的俄國》，以及也介紹過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sup>25</sup>很明顯的，「社會主義研究社」，即是「赤心社」的延續。

組織了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同年 7 月，彭湃又發起組織「勞動者同情會」，此會與社會主義研究社是姊妹組織，它的成員不少是社會主義研究社的成員。會員們組成演講團、劇社，在彭湃的領導下深入城鎮農村進行宣傳或演出；同時開展社會調查。由於勞動者同情會的活動及其影響，使海豐知識份子自五四運動發生以來，服務社會、勞動同情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sup>26</sup>而彭湃在勞動者同情會的〈緣起〉說到要促進勞動者接受教育，要將教育和平民相接近。<sup>27</sup>可知從此時開始，彭湃已經有了從教育入手來進行改革的想法。

1921 年，海豐的勸學所長<sup>28</sup>是陳伯華，行事貪污腐敗不管教育，8 月間學生逼迫陳伯華辭職。此時的彭湃已在海豐小有名聲，於是在 8 月 12 日，海豐學聯會學生請願彭湃為勸學所長。<sup>29</sup>但陳伯華污蔑彭湃，彭湃為了澄清是非，到了廣州面見廣東省長陳炯明。陳炯明並未同意彭湃的社會主義主張，但是頗欣賞彭這個人才，想拉來為己用，便聘請彭湃擔任海豐勸學所長。從此彭湃開始了從教育入手來進行社會革命。

---

<sup>25</sup>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卷〉，頁 10-11。

<sup>26</sup> 華南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廣東海豐縣紅宮紀念館《彭湃傳》編寫組，《彭湃傳》，頁 31。

<sup>27</sup> 李春濤，〈海豐農民運動及其指導者彭湃〉，頁 285。

<sup>28</sup> 1922 年 1 月，勸學所改稱為教育局，彭湃繼續擔任教育局長。

<sup>29</sup> 手中現有資料並未說明為何學生會請彭湃出任勸學所長。筆者以當時情況推斷，彭湃在海豐所組織的「海豐白話劇團」、「社會主義研究社」應早已為他自己打下名號，而彭湃留學歸國的背景，這應該都會令知識份子青年學生為之信服，而要求彭湃出任勸學所長。

1921年10月1日，彭湃就任勸學所長後進行了很多改革，最重要當如進行人事改革，將一些年老教學傳統的教員開除，聘請留學歸國以及北大畢業生來擔任中小學的校長和教員，並舉辦女子學校、提倡體育運動等。值得注意的是，彭湃畫了幅馬克思以及克魯泡特金的畫像掛在辦公室裡，並兼任美術課，也教學生畫馬、列的畫像。<sup>30</sup>由是可知此時的彭湃雖然已經加入了崇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青年團，但是其對於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仍未全部捨棄。

彭湃擔任勸學所長進行了一連串的改革，很快又有了新行動：在五一國際勞動節時，彭湃組織縣城各校學生舉行紀念遊行（因下雨延至四號舉行）；學生們高舉寫著「赤化」二字的紅旗，高呼「勞工神聖」的口號，唱著彭湃編寫的勞動節歌，這是海豐歷史上第一次紀念五一勞動節的遊行。它使海豐的地主豪紳十分震驚，以為將實行「共產共妻」了，遂立刻跟陳炯明說明表達地主們對彭湃的不滿。5月9日，陳炯明撤了彭湃的教育局長一職，縣中跟隨彭湃改革的校長教員也紛紛下台。<sup>31</sup>此事給予彭湃衝擊很大，在彭湃所寫的〈海豐農民運動〉中說到：

1921年間我為海豐教育局長（勸學所長），還是發著夢的想從教育入手去實現社會革命…在縣城舉行五一勞動節，這算是海豐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參加的絕無一個工人和農民，第一高等小學的學生高舉著「赤化」二字的紅旗去遊街，實在是幼稚到了不得！……

…我和李春濤同志等…，自命是工農群眾喉舌，可是背後絕無半個工農，街上的工人和農村的村民也絕不知我們做甚麼把

<sup>30</sup> 華南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廣東海豐縣紅宮紀念館《彭湃傳》編寫組，《彭湃傳》，頁38-40。

<sup>31</sup>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卷〉，頁13。

戲，…下決心到農村去做實際運動。<sup>32</sup>

由這段話可以很清楚明白表達了彭湃的想法，原先彭湃是以教育入手來進行改革，但是勸學所長職務的被撤換，令彭湃明白這守舊的體制是難以溫和進行改造的，他的背後根本沒有廣大群眾的支持；於是彭湃知道，必須要用更強烈的方法來進行，也必須要尋求群眾的支持（所以彭湃在所引文中寫到「發著夢的想從教育入手」、「幼稚到了不得」等語）。彭湃轉移了他的目標，從教育手段轉向到最根本：農民身上。彭湃出身海豐地主之家，自然首先進行會對自己家鄉的農民展開行動；那麼海豐這個地區適合進行農民運動嗎？這要從海豐的歷史地理沿革來分析。

### 三、海豐—從傳統縣城到農運溫床

海豐縣位於廣東省東南沿海。早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海豐已有人類居住。歷夏、商、周至春秋戰國為「南蠻之地」，是百越族的一部份。秦始皇三十三年（西元前 214 年），秦平百越設郡縣，海豐屬南海郡，此時未置縣邑。東晉咸和六年（西元 331 年）設置縣屬，取意於「臨海物豐」，稱海豐縣，屬東官郡。<sup>33</sup>海豐縣之名已有一千七百年左右的歷史。

關於氣候方面，根據清·乾隆十五年、同治十二年續修所編的《海

---

<sup>32</sup>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頁 51。

<sup>33</sup> 鄭正魁主編，《海豐縣文物志》（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 年，初版），頁 1-2。

豐縣志》來看，海豐縣在康熙年間有五年發生過大水或淫雨連綿、四年發生過颶風、三年發生過旱災，其中有一年發生過兩次災害（康熙五十五年 3 月大旱、8 月颶風），有二年發生三次災害。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年間均發生過多次天然災害。<sup>34</sup>由是觀之，海豐縣由於地處沿海，夏秋之間多颶風侵襲；除了颶風甚且有地震、蝗蟲、水患、旱災等天災，而農業是看老天爺吃飯的，故知海豐農民生活勢必不穩定。

海豐縣位處於廣東省境內。廣東省由於其特殊歷史地理背景，客家人南移至此，福建人亦移民至此，加上原先居住之居民及百越民族，廣東文化內涵因此十分複雜及豐富，語言文化也可分成粵語、客語、閩南語、漢語、少數民族語言等。海豐地區大半是閩南人移民及後代，<sup>35</sup>其使用語言則多為閩南方言分支的潮州語系，而兼以少數的客語及更少數的軍話，<sup>36</sup>在文化上則屬於粵東福佬文化區。<sup>37</sup>

在宗族秘密會社方面，清朝屈大均說：「粵東瀕海，其民多居水鄉，十里許輒有萬家之村，千家之砦。自唐宋以來，田廬丘墓，子孫世守之勿替。」<sup>38</sup>自兩宋以降各朝代，廣東宗法家族觀念迅速滋長，動輒因利害關係發生族間械鬥，於是造就官宦大族多置族田以聯繫族人，增強本族勢力。<sup>39</sup>在康熙中葉以後，廣東經濟開始繁榮，並超過明代；於是宗族勢力更加迅速增長，以祠堂族長為代表的宗法勢力，隨著宗族經濟實力而

---

<sup>34</sup> 清·于卜熊纂修、清·蔡逢恩續修，《海豐縣志》〈邑事〉（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初版）

<sup>35</sup> 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頁189。

<sup>36</sup> 李新魁，《廣東的方言》（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版），頁265、450、520。

<sup>37</sup> 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頁394。

<sup>38</sup>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第二卷·遷海〉（台北：廣文書局，1978年，初版），頁117。

<sup>39</sup> 黃淑嫻、龔佩華著，《廣東世僕制研究》（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版），頁88。

增強，對宗族內部的控制愈來愈厲害，人口隨著經濟成長而增加，地盤也擴張，導致利益衝突因素的增加，而引起了械鬥的頻繁發生。<sup>40</sup>

除了宗族勢力的發達以外，自清朝嘉慶以後，海豐地區就有所謂洪門會、三合會、哥老會，<sup>41</sup>自咸豐三年到五年間，三點會在海豐起事聚眾叛亂，<sup>42</sup>後首領被清政府捕殺，但三合會仍然繼續存在和秘密活動，直至辛亥革命。由是之故，在清朝末年，三合會秘密結社之盛行，幾乎普遍了全縣。另，在咸豐年間，官府亦招募各鄉黑旗黨，以黑旗為勇，打壓與官為難之紅旗黨。<sup>43</sup>此黑旗紅旗黨遂成後來海豐縣內紅黑旗爭鬥之源流；爭鬥之多，僅在辛亥革命前一百餘年，較大規模的黑紅兩旗械鬥就有四十多次，每次延續三、五年，有的甚至達十餘年之久，而小的械鬥就更多了。<sup>44</sup>正由於黑紅兩旗會黨的爭鬥，突顯出了會黨在海豐的重要性，所以後來彭湃在成立總農會的時候，必須請會黨之一的重要頭目楊其珊擔任海豐縣總農會副會長一職。<sup>45</sup>也正可從此看出，彭湃成立的農會必須融合各方力量，進一步將此會黨力量融入農會旗下，此將容後再述。

由是觀之，海豐其宗族勢力發達有其歷史淵源，而會黨也在海豐佔有重要地位，故知海豐縣內統治勢力有著宗族、會黨以及官府三方存在，十分複雜。此外，據《海豐縣志》〈邑事〉記載，海豐在清中期以後會黨之叛亂，多倚鄉紳率領鄉勇鎮壓之；故知鄉紳在海豐應有相當之勢力影

<sup>40</sup> 譚棟華，〈略論清代廣東宗族械鬥〉《廣東歷史論文集》（台北：稻禾出版社，1993年，初版），頁262。

<sup>41</sup> 葉左能、蔡福謀，《海陸豐農民運動》（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初版），頁4。

<sup>42</sup> 清·于卜熊纂修、清·蔡逢恩續修，《海豐縣志》〈邑事〉

<sup>43</sup> 同前註，頁262。

<sup>44</sup> 楊紹練、余炎光，《廣東農民運動》（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初版），頁17。

<sup>45</sup> 鄭建生，《動員農民：廣東農民運動之研究（1922~1927）》，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頁10。

響。宗族如有其政權勢力之後，也成鄉紳之一，其勢力將更龐大。自然地，宗族鄉紳們隨著勢力龐大，也將購置許多田地成族產或私產，而成海豐地主。由前述可知，海豐自清中葉以來，在宗族鄉紳地主統治之下，自然會因其不喜人民叛亂，而有著傳統保守之統治風氣。（尤其海豐又因會黨盛行，故統治者自會更加強統治以避免咸豐年間亂事重演。）

1920年5月，海豐縣客家人陳炯明以「粵人治粵」作號召，逐走廣西軍閥而得以進入廣州，自任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廣東省東部和中部大體在他統治之下。陳炯明統治廣東的方式是不否定既成的社會體制，並以此作為支持其政治權利的基礎。因此在海豐，與清朝時代一樣，以家族、宗族的習慣和倫理，以及地主佃農間的習慣和倫理為支柱的傳統和威信的統治依舊如故。<sup>46</sup>因此，在陳炯明統治下的廣東，舊社會體制堅如磐石。但是時局的變換及海豐本身因素加上陳炯明帶來的不自覺刺激令得這守舊的海豐城起了變化，破壞了舊的社會體制。

在當時的海豐，因為軍閥的混戰所造成的農地的荒廢和賦課累積<sup>47</sup>導致一般農民的貧困化，尤其是自耕農淪落成爲佃農，結果造成彭湃所說：「二十年前有十戶自耕農的鄉村，最近只有二、三戶。二十年前村裡有許多貢生、秀才、讀書人、穿鞋子的文人，但現在不但沒有讀書人了，連穿鞋子的人也完全絕跡。」<sup>48</sup>也因此，對於這種更加貧困的社會現狀農民們自然會感到強烈的不滿。

軍閥激烈的輪替和混戰，在全中國造成相當程度的流動，特別海豐是陳炯明的故鄉，因此簇出發跡的軍人和爆發官僚，出現「縣長多如狗，

---

<sup>46</sup> 衛藤瀋吉，〈海陸豐蘇維埃史·上〉，頁60。

<sup>47</sup> 陳炯明主政廣東之時，其軍餉從1920預徵到1930，可見稅賦之重。見張江明，〈彭湃關於農民運動的理論和實踐〉《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頁14。

<sup>48</sup>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頁37。

司令滿街走」<sup>49</sup>的怪現象，這種階層的流動，一定促進了既定的威信和傳統的崩潰。同時以陳炯明親戚爲首的暴發戶購買土地，成爲新興地主，不守舊地主傳統，對於佃農更加剝削，令佃農怨恨，價值基準亦隨之動搖。<sup>50</sup>

從佃耕自耕比例來看，如下表所示：

	自耕農	佃農	自耕農兼佃農
全國平均值 <sup>51</sup>	49.83	29.35	20.59
廣東省平均值	35.5	37.3	29.1
海豐縣平均值 <sup>52</sup>	約 20%	約 55%	約 25%

由此表可看出廣東省佃農、自耕農兼佃農的所佔比例高於全國平均值，自耕農所佔比例亦低於全國平均值。此外，海豐縣在廣東省全省之中佃農比例算是很高的。所以在海豐，佃農加上自耕農兼佃農的比例佔全縣約百分之八十，如果這謝農民一旦被煽動或團結起來進行農民運動，將成爲一股龐大可觀的力量。

除了佃農比例過高以外，現將農民一年生活費用收入支出列於下表：

<sup>49</sup> 葉左能、蔡福謀，《海陸豐農民運動》，頁 8。

<sup>50</sup> 衛藤瀋吉，〈海陸豐蘇維埃史·上〉，頁 61。

<sup>51</sup> 全國平均值、廣東省平均值依據 1917 年農商部統計，轉引自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一八六〇—一九一六）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2 年，初版），頁 80。

<sup>52</sup>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頁 44。

耕一石穀種田的耕民一年生活統計表：<sup>53</sup>

	收入項目	收入金額	支出項目	支出金額
	每石種田平均 一年可收穀十 五石，每石穀價 銀約六元	一年九十元	繳交地主田租（五成 計算）	四十五元
	副業	四元	穀種一石	六元
	小計	九十四元	購買肥料	三十元
			修理農具	二元
			飼牛食料	三元
			每個農民一年生活 費	八十元
			小計	一百六十六元
總結	農民一年虧損七十二元			

雖然此統計表格為民國 15 年之調查，且是指當時一般農民而論，並非特指海豐地區。但是顯示出的數字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畢竟農民的生活費用以及地租大約說來所佔比例不會差距太大，即使數字不同，但比例仍是相當的。如富裕地區收入較高，但其支出比例亦會相對提高，反之亦然。而由此表可知，扣除田租部分之後，一般農民的生活仍然是入不敷出，田租低生活較不苦，田租高生活更苦。所以農民幾乎要依靠借貸才能生存，故農村之中的借貸來源很多，<sup>54</sup>借貸方式亦多。<sup>55</sup>

<sup>53</sup> 譚平山，〈農村的政治鬥爭·上〉，《中國農民》，第二期，1926年2月1日，頁6。

<sup>54</sup> 依據郭德宏，《中國近現代農民土地問題研究》（青島：青島出版社，1993年，1版），頁129中提及廣東省的農村借貸來源百分比，依多至少的順序為：地主、商人、典當、商店、富農、錢莊、銀行、合作社。

<sup>55</sup> 根據一九二六年中共廣東區委所寫的〈廣東農民運動報告〉，收錄於《廣東農民運動資料選編》，頁39中提及，廣東東江方面的借貸關係有：暗借、典借、



另，民國初期五四新文化運動造成全國思想界的革新，此風潮無可避免的亦影響了海豐。根據海豐五四運動的參加者陳修回憶，「海豐訂購和收到贈送的報刊不可勝數。最重要的有北京的《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上海的《星期評論》…等刊物，廣州和香港的報紙之外，有上海的《民國日報》，北京的《晨報》等報紙，以及各種叢書小冊子等。」<sup>56</sup>故海豐文化思想界也受到了各種新思潮的刺激，自然也會開始對傳統保守的風氣及陋習有所不滿。

綜上所述，海豐之所以能成爲農運溫床有著它獨特的歷史地理背景。首先，天災頻仍、米價容易隨之升高，如遇政府官紳開倉濟糧即可無事；但如官府吏治不彰，或鄉紳地主哄抬米價，則動亂易生。其次，海豐佃農比例高、支出大於收入，生活貧困；並且宗族勢力發達，會黨的盛行、紅旗黑旗兩黨互鬥，造成海豐人無法團結反抗宗族地主，以致宗族勢力更加穩固，傳統保守的心態勢更濃厚。然而陳炯明的崛起造成海豐階級的流動，對於舊社會的體制有了些許衝擊；再加上五四運動及新文化運動新思潮引入的影響之下，海豐知識份子也逐漸開始了不滿，當中最重要知識份子即海豐當地有名的地主之子、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彭湃。有了在日本從事農民運動的實際經驗，彭湃開始在其故鄉，農民生活困苦的海豐，開展農民運動。

---

租仔、高利貸等四種。

<sup>56</sup> 轉引自葉左能、蔡福謀，《海陸豐農民運動》，頁 10。

#### 四、海豐農民運動的開展

1922年，彭湃開始了一連串的農民運動。<sup>57</sup>彭湃剛開始進行時，遇到了許多困難，他熱心接觸農民，但農民卻多對其不理不睬；而身為地主的彭湃家人也對他的行動不滿，彭湃說「除了三兄和五弟，其餘人都恨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殺我而甘心」，<sup>58</sup>由此可見彭湃所遭遇的困難之大。

後來彭湃細細思索無法打進農民的原因。發現原因在於他本身的穿著特殊，說話又文雅，農民無法將他當成自己人；於是彭湃改變穿著，甚至也不穿鞋子，帶著旱煙筒來跟農民用白話不用文謔謔的語言聊天。彭湃選了個農民必經的歇腳道路，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如先表演魔術、用留聲機播放唱片、先教牧童唱民歌，因此吸引了大批農民圍觀，於是彭湃開始了他的宣傳演說。<sup>59</sup>

隨著彭湃宣傳演說的順利，農民也漸漸開始瞭解到彭湃的主張，彭湃用「耕田虧本」的道理來說明農民痛苦的根源：「(地主)年年閒逸無做工，你們耕田耕到死，結果將租穀給他收去…他們一塊田才值百元，…

---

<sup>57</sup> 彭湃在其所寫〈海豐農民運動〉中寫明他開始農民運動是在1921年5月間，但是衛藤瀋吉所見的早稻田學籍簿記載此時彭湃仍應在日本就讀，如何分身在海豐呢？見衛藤瀋吉，〈海陸豐蘇維埃史·上〉，頁64。且，鍾貽謀，《海陸豐農民運動》（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57年，初版），頁125中提及《陸安日刊一週年紀念增刊》所附的〈陸安大事記〉中說到彭湃擔任勸學所長為1921年10月、彭湃於1922年5月4日發動學生遊行。由前文所引之〈海豐農民運動〉之邏輯推演，彭湃應當於1922年4月以後才開始進行農民運動。

<sup>58</sup>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頁52。

<sup>59</sup>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頁54。彭湃本身說的是福州話，不大懂得鄉民的客家話，為了向農民宣傳，於是學會說客家話和客家山歌。可見彭湃對於接近農民之用心。見〈彭湃同志和革命歌謠〉，收錄於海楓，《海豐文化革命概述》一書之附錄，頁148。

你們交了多少的穀？…需和地主討回這筆帳」，並且說農民要有團體團結起來如此跟地主要求減租才容易成功。<sup>60</sup>彭湃用了很多精力來進行農民運動，甚至將他自己所擁有的一份土地田契燒掉，叫農民從此以後不必還租，同時自己過著儉樸的農民生活。<sup>61</sup>農民因大範圍的土地被釋出（因彭湃家乃大地主，他自己擁有的土地非常多）當然也就開始更加相信彭湃，給予支持。

彭湃到處演說告訴農民團結的重要性，一段時間之後終於吸引了五個人。五個人漸漸拉其他的農民加入，於是 1922 年 10 月 25 日，召開赤山約農會成立大會，彭湃草擬組織章程。農會努力解決農民的切身利益問題：排解農民的糾紛、反對地主吊佃加租，特別是創辦農民醫藥房，優待會員治病，更受農民歡迎。農會威望日高，農民入會日眾，很快形成了加入農會的熱潮，由赤山約而平岡約…十餘約都成立了約農會。<sup>62</sup>於是彭湃計畫組織總農會了。

1923 年元旦，海豐總農會宣告成立。在成立大會上選舉彭湃為會長。總農會下設文牘、農業、宣傳等九個部，下轄海豐各約農會。總農會制訂了黑赤兩色分四角聯合的會旗，象徵原來海豐境內的紅旗、黑旗兩黨農民團結起來。彭湃並為總農會起草了臨時簡章，提出農會的綱領是：圖農民生活之改造、圖農業之發展、圖農民之自治、圖農民教育之普及。農會所取的政策是對付田主和官廳，即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要求。<sup>63</sup>

---

<sup>60</sup>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頁 53-54。

<sup>61</sup> 鍾貽謀，〈海陸豐農民運動〉，頁 14。

<sup>62</sup> 鍾貽謀，〈海陸豐農民運動〉，頁 21。

<sup>63</sup>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卷〉，頁 19。

海豐總農會會員達二萬戶，人口約十萬人，佔全縣人口的四分之一；成長到這種地步自然能夠動員群眾，造成很大的政治效果。如將許多市場（如糖市、菜脯市、米市等）的實權從士紳階層的手上轉移歸農會管轄、農民學校的建立、農法的改良及普及、訴訟紛爭調停，以及免費為會員診治的醫療救濟等。<sup>64</sup>農會雖有這麼大的政治效果，但它很明白仍無法與統治者正面對決，所以仍採取較溫和的辦法，對內口號是「減租」、「廢止雜租」，對外為盡量避免與統治階層的摩擦，鼓勵「改良農藥」「增加農民知識」和「慈善事業」，並以五年為準備期間。<sup>65</sup>但是無法避免的，農會仍然與地主之間起了衝突。

1923年3月，地主朱墨毫無緣由的便要提高地租，余坤為首的六個佃戶因其為農會會員，有團體的勢力為奧援，故不加以理會。朱墨大怒告上法庭，要求賠償及施以處罰。傳統上，地主要是向法庭控告佃戶，幾乎都是贏家；不料這次結果卻不同，余坤等人在農會的協助下，贏得這次的訴訟案件。如此的意外令地主們大吃一驚，開始警覺到農會勢力的存在，對於地主的利益是重大威脅。海豐地區的地主，開始籌組地主的聯合組織—「糧業維持會」，圖與農會組織相抗衡。地主的聯合組織成形後，對法庭關說施壓，使法庭推事改變先前判決，將余坤等六佃戶收押。農會在得知此事之後，認定司法程序已失效用，唯有訴諸群眾的力量方可挽回劣勢。農會乃下令動員，集合農民共六千多人，由彭湃率領向法庭出發，推事攝於群眾的聲勢，不得不放出在押的農民。獲得勝利的農民十分歡騰，彭湃趁此機會發表演說，指出團結農會力量的偉大，加強農民對農會的認識。農會被視為是代表農民本身利益奮鬥的機關。<sup>66</sup>

<sup>64</sup> 楊紹練、余炎光，《廣東農民運動》，頁31-32。

<sup>65</sup> 衛藤瀋吉，〈海陸豐蘇維埃史·上〉，頁65。

<sup>66</sup>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頁70-75。鄭建生，《動員農民：廣東農民運動之研究（1922~1927）》，頁11-12。

農會獲得了大成功，聲威因此傳遍四方，其他相鄰各縣也有農民陸續來參加海豐農會，海豐總農會變成惠州農民聯合會。1923年5月，改組成爲廣東省農會，彭湃被推選爲廣東省農會執行委員長。廣東省農會設在海豐，同時兼攝海豐縣農會的職權。以海豐爲中心的粵東農民運動出現了蓬勃發展的景象。<sup>67</sup>

海豐本處在舊社會的磐石之下，但隨著縣內知識份子的努力（彭湃爲首），漸漸的有了革新作爲。從彭湃任勸學所長時期的五一勞動節紀念遊行，一直到農民團結組織—赤山約農會的成立，農會會員擁有的優待與好處令入會人數不斷激增，最後終成立海豐縣總農會。與地主的抗爭之中，農會給予被壓迫的農民極大幫助，各縣聞風而響應，於是廣東省農會成立。海豐從偏僻的縣城一躍而成粵東農民運動中心，這初生之犢可說是威風凜凜；但是隨後守舊勢力的反撲終究令他嚐到了挫敗的滋味。

## 五、暫時的挫折與轉向

農會這樣快速的發展，一定會引起士紳以及縣的行政當局的不安。唯因一方面農會也意圖盡量避免衝突；另一方面農會運動本身，以彭湃爲首，並加以一些年輕但社會地位比較高的教員和學生，因此無從摘掉這個反抗的幼芽。這農民運動如果是由佃農自己主導，地主一定早已不留情的予以鎮壓，但問題是對方是以大地主的兒子，留學回來的彭湃爲首的教員和學生時，自不能將其關進押佃所，也不能關進警察局。<sup>68</sup>成立農

<sup>67</sup>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卷〉，頁23。

<sup>68</sup> 衛藤瀨吉，〈海陸豐蘇維埃史·上〉，頁65。

會當時的縣長翁桂清以及其後的二任縣長均默默觀看，未給予太大鎮壓動作。但是直到陳炯明任命王作新為縣長之後，此時彭湃領導的農會勢力茁壯強大，已非是反抗的幼芽，於是地主豪紳們開始等待機會。

機會很快來到。1923年夏，颱風侵襲了海豐，強風吹襲二十多小時「倒壞房屋無算，田禾完全失收」，<sup>69</sup>此次農業損失可說為海豐有史以來未曾有之大損失。農會對此提出三個解決方案，經過全縣代表大會表決後，決定「受到颱風損害的農民，非拼命與地主爭取不可…。現在地主無武裝力量，也不能利用駐屯軍。縣長王作新雖然站在地主那一邊，但其手下的游擊隊只有三、四十人。應該發動最低限度減少七成的減租運動。」並以「最多繳納三成租」為口號。<sup>70</sup>由這邊我們可以看出，農會其實是相當理性，並且還會審時度勢來做出對自己最有利之事。

農會推出繳納三成租的口號，展開減租運動，少部分小地主遵照農會決議收三成租，而其餘大地主士紳階級遂展開反抗。農曆7月4日（國曆8月15日）兩萬多農民要來參加全縣農民大會時，縣長王作新佈告說：「匪首彭湃希圖造反，四鄉人民勿為所愚而自招重禍。」並以警察扼住要路，不准農民來縣參加大會，但農民趕走了警察，佈告被撕破；王作新大驚，乃集合警察、游擊隊，而農民已到會四五千，王作新遂向汕尾鐘景棠部隊「派兵來縣鎮壓土匪」。晚上，部隊進入縣城，翌日（農曆7月5日），王作新集結各武力部隊，兵分兩路包圍突擊農會本部，逮捕了農會職員會員等25人，當被25人過街巷時，地主劣紳等軍打掌稱賀。<sup>71</sup>王作新並解散農會四貼佈告通緝彭湃等人。並派出各區警兵四出下鄉逼

<sup>69</sup> 李春濤，〈海豐農民運動及其指導者彭湃〉，頁308。

<sup>70</sup> 衛藤瀨吉，〈海陸豐蘇維埃史·上〉，頁65-66。

<sup>71</sup>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頁98、99。

交租，並查繳農會會員證章，百般騷擾。<sup>72</sup>此即為震動全省的七·五農潮。

1923年，陳炯明被雲南、廣西軍逐出廣州，駐屯於老隆。七·五農潮後，彭湃前往老隆地區請陳炯明釋放此事件中被逮捕者、及希望減租三成（因為凶年）和恢復農會；陳炯明雖然肯定彭湃的農民運動，<sup>73</sup>但又不能不顧故里紳士階層的利益，所以採取拖延政策；忍不住的彭湃，便奔走於汕頭、海豐、香港之間，然後又到老隆繼續催促陳炯明，不久陳炯明即為進攻廣州而移駐汕頭，更前進惠州；彭湃留在汕頭，策劃組織了惠潮梅農會。<sup>74</sup>成立惠潮梅農會的消息以及彭湃受到陳炯明的賞識，這些皆對在海豐的王作新和鍾景棠構成心理上的壓迫，王作新終於釋放了被拘留中的農民。幾個月的奔走，彭湃終於獲得了勝利，但這勝利是短暫的。

1924年3月，彭湃打算慶祝農會的重建；但王作新以及海豐士紳階層向陳炯明報告農會有危險性，尤其農會與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sup>75</sup>於是陳炯明決心予以鎮壓，農會因此被解散。陳炯明此時勢力雖已有所衰退，但農會力量仍太小，不足以對抗；於是彭湃立刻召集農民代表會議，代表會議以為：「應取消公開的組織而為秘密的，同時彭湃…亦需即時離開此地，向外發展聯絡，…」，並留下一些同志在海豐暗中維持組織。<sup>76</sup>彭湃到了廣州投奔此時已和陳炯明勢成水火的孫中山，進而為國

<sup>72</sup> 衛藤瀋吉，〈海陸豐蘇維埃史·上〉，頁66。

<sup>73</sup> 依據陳定炎編，《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初版），頁627〈海豐之減租運動〉條所載，陳炯明主張海豐減租三成，此雖與其他史料所載語法有所出入（其他史料書籍多為農會主張，而此書卻是陳炯明先提，農會再依此處理），但陳炯明肯定農民運動應是可以確立的。

<sup>74</sup>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頁73-85。

<sup>75</sup> 此時彭湃已經加入中共、國共已經合作，陳炯明亦已和國民黨鬧翻。

<sup>76</sup> 彭湃，〈海豐農民運動〉，頁93。

共第一次合作效力。<sup>77</sup>海豐農民運動的初期也就在陳炯明的解散農會之下，暫時告一段落。海豐農會雖然被迫解散，但組織並未就此解體。海豐縣總農會副會長楊其珊與海豐農運的中心幹部，另秘密成立「十人團」；其口號是「打倒陳炯明」、「農民革命大成功」，總團機關並設在彭湃家中之「得趣書室」，<sup>78</sup>可見其與海豐農會有著緊密關係。由公開轉入地下秘密活動的組織，將留待日後國民黨東征之時東山再起。

由上所述，海豐農民運動之發生，除了海豐人文環境的因素、彭湃的推動以外，還有第三股力量深深影響著海豐農民運動的推展：陳炯明。陳在廣東主政約十二年之久（1912-1924），其間雖有不得勢之時，卻仍有其影響力。本文所注意之海豐農民運動時間斷限在 1921-1924，故身為廣東主政者、海豐地主的陳炯明，自然會對農運有其影響力。由前文之分析可知，陳炯明對於彭湃很是欣賞，甚至推舉彭湃成為海豐勸學所長；對於農民協會的成立也並未阻擋。當七·五農潮發生後，地主農會雙方均曾給予陳炯明意見，陳未解散農會，且保持中立，並未給予雙方太多指示。當時的海豐縣長看陳炯明並未偏袒自己這方，迫於心理壓力而釋放了被押禁的農民，此事反倒令農會成功在荒年減租三成而獲得另一次的大勝利。1924 年，大環境的變化（國共兩黨正式進入農會勢力），加上地主宗族的龐大壓力，終令陳炯明下令解散農會，醞釀發展多時、會員達七十多萬的農民協會因此轉入地下。職是之故，陳炯明對於農會的支持與否，實直接影響了農會的合法存在地位。

---

<sup>77</sup>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頁 203

<sup>78</sup> 華南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廣東海豐縣紅宮紀念館《彭湃傳》編寫組，《彭湃傳》，頁 97。同頁之注 1 並提及，十人團組織嚴密，每十人組成一團，然後十個人再單獨分別找尋十人，另組一新的十人團；凡加入者要舉行宣誓、飲雞血酒等儀式；海豐全縣約建立了一百多團，團員一千餘名。十人團之領導者為楊其珊，楊本即為海豐會黨之一的領袖，而十人團的加入儀式又帶有明顯之會黨色彩，可見在海豐，即使成立了農民協會，會黨勢力仍十分龐大，農民運動必須與其互相合作。



## 六、結語

海豐縣自東晉以來即有約一千七百年的歷史，自清朝所載的《海豐縣志》來看，其物產雖豐饒，但天災多；尤其颶風更常侵襲海豐。推之民國初年，海豐自仍常有颶風侵襲，農作物勢必隨著天災而有所受損；加以 1920 年代海豐佃農比例甚高，故地主對於農民的影響自大。另海豐自唐宋即有的宗族力量，秘密會黨勢力的龐大，傳統守舊的氣息濃厚，這些都是令農民生活無法平穩的因素。當新知識傳入海豐，革新開始迅速蔓延。陳炯明的統治令海豐舊社會體制更加穩固，但卻也敵不過革新潮流。彭湃回到家鄉以後推展農運，在有著諸多有利因素的海豐農運溫床之下，而造就了近代粵東農民運動的高潮，箇中原因自也可知。

彭湃出身於大地主之家，也因其大地主的出身，可在海豐釋放出許多土地來進行農民運動。彭湃小時候受到其母周鳳影響很深；赴日留學更令彭湃沾染了無政府主義思想，並對社會主義有所瞭解，也與日本的中國共產主義小組接觸。回國以後可能因與陳獨秀的認識，及當時中國社會主義的流行而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對於社會主義有了更深一層的瞭解。隨後憑藉自己在知識界的聲望，以及陳炯明的賞識擔任了海豐勸學所長。在此之前不久，陳獨秀亦擔任了廣東省教育局長；以彭湃曾與陳接觸的經驗及其辦理教育的革新理想，或許受到陳氏的影響。以教育入手改革社會的理想終究無法對抗海豐傳統的舊勢力，於是彭湃轉向自小即關注的農民。海豐縣本身具有的有利條件，令海豐農民運動在短時間內發展成型，但仍舊遭受傳統勢力的反撲，而受到暫時的挫折。在七·五農潮之後的到處奔波為農民請命但仍遭失敗的過程之中，彭湃深知憑一己之力實無法與地主、軍閥等舊勢力對抗，必須以組織部勒，方

有可為，遂在 1923 年年底、1924 年初之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sup>79</sup>雖然彭湃本身即是中共黨外圍組織青年團的成員，但是七·五農潮發生後不久，彭湃仍舊覺得「中國共產黨大不明白，恐怕是無當用吧。」<sup>80</sup>相信農會終究遭到解散的挫折，是促使彭湃決定成為中共黨員尋求政黨奧援的主要原因。

不久國民黨東征，廣東省舊軍閥勢力大減，農民幫助了東征的進行，東征卻也有利於農民運動的推廣。海豐農民協會在經陳炯明鎮壓後恢復。農民運動死灰復燃。隨後國民黨聯俄容共，彭湃以中共黨員身份加入了國民黨，並且在農民部擔任秘書，手中握有實權。心繫農民的彭湃主導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開辦，為全國農民運動培育許多幹部。自此不僅海豐，全國均開始了以海豐為經驗的農民運動。

---

<sup>79</sup> 關於彭湃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間，由於目前未有原始檔案能夠證明彭湃入黨的詳細時間，故一直未有明確定論。目前只能夠彭湃相信是在 1923 年 10 月以後至 1924 年 2 月這段時間入黨。相關文章可參看劉林松，〈彭湃烈士入黨時間問題的商榷〉《黨史研究資料》第一集，1982 年，頁 323-333；蔡洛、余炎光等，《彭湃傳》，頁 89。

<sup>80</sup> 〈彭湃給文亮〉（1923 年 9 月 7 日），收錄於《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1 版），頁 42，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卷〉，頁 30 下之註腳 1。

## 參考書目

### 一、史料、文集，及專書

1. Roy Hofheinz, JR., *The Broken Wave—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 人民出版社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10月，初版）
3.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二版）
4. 王曼、楊永，《彭湃傳》（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初版）
5. 司徒尚紀，《廣東文化地理》（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初版）
6. 李新魁，《廣東的方言》（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1版）
7.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台北：三民書局，1996年，初版）
8. 海楓，《海楓文化革命概述》（香港：中報週刊，1969年，初版）
9.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一八六〇-一九一六）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2年，初版）
10. 清·于卜熊纂修、清·蔡逢恩續修，《海豐縣志》〈邑事〉（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初版）
11.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第二卷·遷海〉（台北：廣文書局，1978年，初版）
12. 郭德宏，《中國近現代農民土地問題研究》（青島：青島出版社，1993年，1版）

13.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初版）
14. 陳定炎編，《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初版）
15. 陳善光編著，《青年運動史論集》（廣東：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1988年，初版）
16. 彭湃，《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1版）
17. 彭湃研究史料編輯組編，《彭湃研究史料》（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
18. 華南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廣東海豐縣紅宮紀念館《彭湃傳》編寫組，《彭湃傳》（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初版）
19. 黃淑娉、龔佩華著，《廣東世僕制研究》（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版）
20. 楊紹練、余炎光，《廣東農民運動》（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初版）
21. 葉左能、蔡福謀，《海陸豐農民運動》（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初版）
22. 蔡洛、余炎光等，《彭湃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初版）
23. 鄭正魁主編，《海豐縣文物志》（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初版）
24. 鍾貽謀，《海陸豐農民運動》（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57年，初版）
25. 譚棣華，《廣東歷史論文集》（台北：稻禾出版社，1993年，初版）

## 二、期刊文章及碩士論文

1. 王拱璧，〈東遊揮汗錄〉《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2期。
2. 余炎光，〈彭湃思想發展初探〉《暨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3期。
3. 周鳳，〈彭母談彭湃〉《海豐文史》第四輯，1986年。
4. 張江明，〈彭湃關於農民運動的理論和實踐〉《近代史研究》
5. 劉林松，〈彭湃烈士入黨時間問題的商榷〉，《黨史研究資料》第一集，1982年。
6. 衛藤瀋吉作、陳鵬仁譯，〈海陸豐蘇維埃史·上〉《共黨問題研究》，1999年第8期。
7. 鄭建生，《動員農民：廣東農民運動之研究（1922～1927）》，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8. 譚平山，〈農村的政治鬥爭·上〉《中國農民》，第二期，1926年2月1日。

